

薛谋洪 吕杰

英美特殊关系



英国

对华政策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 British Policy
toward China
(1949-1954)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英美特殊关系

与

英国

对华政策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 British Policy
toward China
(1949-1954)

薛谋洪 吕杰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 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美特殊关系与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薛谋洪, 吕杰著.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3.11
ISBN 7-5605-1762-5

I. 英… II. ①薛…②吕… III. ①英美关系-研究-1949~1954 ②对华政策-研究-英国-1949~1954
IV. ①D856.12 ②D822.3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372 号

书 名	英美特殊关系与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
著 者	薛谋洪 吕 杰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兴庆南路 25 号(邮编:710049)
电 话	(029)2668357 2667874(发行部) (029)2668315 2669096(总编办)
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
字 数	173 千字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875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5-1762-5/D·46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对外斗争,主要的对手当然是美国。对建国初期的中美关系,国内不少学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收集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相关的学术专著汗牛充栋;相对说来对那段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它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都挖掘不够。

英国是欧洲和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近代时期,英国在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都发挥过巨大作用,并且出现了被称为“大不列颠治下和平”的局面。到20世纪,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还是“冷战”后时期,英国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英国还是一个有着悠久外交传统和丰富外交经验的国家,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许多行为表现了相当的外交智慧。二战结束后不久,英国的国力虽然因这场战争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其综合经济力量在西方国家中仍名列前茅;在国际政治领域里一度还保持了“三巨头”之一的独特地位。它不仅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而且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保持了长久的“特殊关系”,在战后若干重大国际事务的处理中都可以感受到英国的影响。

“冷战”期间英国在很多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表现出同美国相左的态度,甚至推行了独立的、与美国不同的政策。在对待有关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上,英国对外政策表现出了少有的同美国的公开分歧。新中国初期的英国对华政策,是观察、理解英国“冷战”政策一个侧面的窗口。虽然从1949年到1954年只有短短5年时间,但在这段时间内,英国对华政策涉及到不少对中国而言

十分敏感且重要的问题,如对新中国政权的承认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台湾问题以及朝鲜战争问题等;英国这段时间的对华政策直接影响到此后将近 20 年英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和变迁。研究英国这段时期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其对华政策,对于更深入地理解“冷战”这段特殊历史,更全面地理解英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传统和它在二战后对外政策的一般模式,都有重要意义;对将来如何更好地处理同英国的关系,以及判断、理解英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也有参考价值。

本书旨在根据迄今能见到的史料,尽可能详尽而客观地介绍从 1949 年到 1954 年英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并力图从英美特殊关系的角度解读英国当时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以及影响着这一决策的美国因素。本书从 1949 年出现的英国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一直写到中英两国通过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实现“半建交”关系,此时间段之前的事情书中作为背景情况进行了简要的交代,1954 年之后的事情则不在本书谈论的范围之内。本书内容涵盖了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台湾问题、朝鲜战争问题、以及中英两国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的交往情况。虽然本书讨论的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但所有这一切仍同我们当前面对的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现今仍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比如伊拉克战争等,看到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本书希望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对华政策影响的研究,找到一些规律,从而为分析当前国际形势提供一些可能的方便,同时也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本书力求言必有据,所引用的材料包括英国和美国政府已经公开的外交档案,以及美国和英国学者在相关方面的著述。

薛谋洪教授在 2000 年提出了本书的主题构想和写作框架,在

薛教授的指导下,吕杰利用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攻读硕士的时间完成了本书大部分的写作。吕杰毕业后继续本书的写作,并于2002年9月完成了初稿。后经两人间反复互动,在2003年初最终定稿。应该说,写出这本书吕杰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心血。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1)
一、新中国初期英国对华政策概述	(1)
二、冷战大环境下英美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及各自计划采取的政策	(3)
三、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	(10)
参考文献	(18)

第二章 不成功的接触:英国承认新中国政权的政策	(22)
一、英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	(22)
二、英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态度的变化	(36)
三、英国在承认新中国过程中的外交努力	(45)
四、艰难的建交谈判	(51)
参考文献	(60)

第三章 艰难的赞成票:英国在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上的表现	(64)
一、游说积极、投票保守(1949年到1950年4月)	(64)
二、一波三折、姗姗来迟(1950年5月到1951年2月)	(69)
三、压力重重、被迫后退(1951年3月到1954年)	(77)
参考文献	(83)

第四章 坚持还是背弃《开罗宣言》: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选择	
.....	(86)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以及英国同台湾问题的关系.....	(86)
二、附和“台湾地位未定论”(1949年初到12月).....	(88)
三、默认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1950年1月到5月)	
.....	(93)
四、大力寻找妥协方案(1950年6月到10月).....	(97)
五、在美国压力下步步退让(1950年11月到1954年)	
.....	(102)
参考文献.....	(114)
第五章 防止战火蔓延:英国对朝鲜战争的主要考虑	(117)
一、英国同朝鲜问题的关系	(117)
二、坚决的态度、犹豫的行动.....	(119)
三、部分贸易禁运?全面经济制裁?	(126)
四、竭力防止朝鲜战争扩大	(133)
五、停战协议和战俘问题	(174)
参考文献.....	(194)
第六章 尾声:迟到的中英正式会晤	(203)
一、中英各自设想中的日内瓦会议	(203)
二、中英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接触	(206)
三、日内瓦会议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209)
参考文献.....	(210)

第一章 绪论

“冷战”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一直是国际政治学者关注的问题,相当多的研究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作为资本主义阵营代表的美国同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和中国之间关系的研究上,而关注英国在“冷战”期间对外政策尤其是英国对华政策的学者,相对而言就少多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少人认为当时英国因国力的削弱,及其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不过是美国的附庸而已,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明显独立的政策。实际上,“冷战”期间英国在很多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表现出同美国相左的态度,甚至推行了独立的、与美国不同的政策。在对待有关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上,英国对外政策表现出了少有的同美国的公开分歧。新中国初期的英国对华政策,则是观察、理解英国“冷战”政策一个侧面的窗口。

一、新中国初期英国对华政策概述

纵观英国在新中国初期(1949~1954)的对华政策,很容易发现它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即摇摆不定。例如,英国在经历了一系列外交推动之后,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的政府,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联合国于1月13日进行的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表决中,英国却投了弃权票。英国这种弃权政策一直持续到1950年8月,然后才在安理会第一次投票支持苏联把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安理会议事日程。可是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投赞成票的政策却并没有维持多久。1951年6月5日,英国政府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会议上又投票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暂停讨论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并把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1961年。

在台湾问题上,英国政府的政策也有类似的反复。在1950年

1月承认新中国之前,英国主要附和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的政府之后,英国默认了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朝鲜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入朝作战后,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动摇,最终倒向了美国分隔大陆和台湾的政策。

在中国抗美援朝期间,英国除了在朝鲜战场上同中国军队正面冲突外,还参加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并附和了美国在联合国推动的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与此同时,英国却也通过其他外交渠道同中国进行接触和沟通,并努力对美国在朝鲜以及对中国的政策施加影响,希望能防止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并使这场战争尽早结束,但英国的种种努力最终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英国对华政策中这些相互矛盾的表现,使新中国对英国的意图疑虑重重;英国政策的摇摆让中英两国间本已困难的沟通和接触更加难以推动,两国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谈判也因而不能顺利完成。虽然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马上就向中国派出外交官员,但中国并没有采取同样的措施,因此两国政府在这段时期的交流并不充分。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英两国外长才有机会进行正式的接触,并就两国关系的发展交换意见。在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4年后,中国向英国派驻了第一名正式外交官员作为中国驻英临时代办,双方才步入“半外交关系”,并一直持续到1972年。

为什么1949~1954年的英国对华政策会时常摇摆呢?

其主要原因一是,当时英美两国的对华政策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它们都希望防止新中国在亚洲扩散共产主义,力图避免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但对为达到此目的而如何同新中国打交道意见不一;二是,当时英美两国间存在着“特殊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的特点是英国更有求于美国。当美国对英国施加强大压力时,英国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原有打算,而屈从于美国的意图。因此,英

国的摇摆在许多场合是美国干扰的结果。

二、冷战大环境下英美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及各自计划采取的政策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了那篇被美国人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的演讲,随后不久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凯南(George Kennan)在2月22日向美国政府发送了那份著名的“8千字电报”,3月5日已经下野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铁幕演说”,9月24日美国政府有关美苏关系的“克利福德报告”出台,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特别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1]。这一系列事件紧锣密鼓地发展加速了美苏在二战中建立和发展的同盟关系的破裂,标志着“冷战”的全面展开。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彼此之间加强了联系,并迅速形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强化了资本主义阵营;苏联则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强了同东欧国家的联系,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自此“冷战”就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彼此不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间的直接对立。

在亚洲,“冷战”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此时的苏联已经作为世界大国屹立在欧亚大陆,东欧则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政权,它们都坚持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主义思想在一些国家同其民族解放思潮结合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开展。英国当时的马来亚、新加坡等殖民地,都出现了公开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组织,这无疑让英国和美国非常担心。它们害怕正在积极谋求扩张的苏联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对亚洲进行渗透,扩散其影响力。苏联的这种渗透一旦获得成功,不仅英国在亚洲的各种经济利益会损失殆尽,美国在亚

洲推行其全球战略的计划也会受阻。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亚洲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世界范围内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将直接威胁到美国 and 英国自身的安全。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明确指出,“美国政府的方针必须是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英国政府也认可了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亚洲政策的目标^[2]。因此英国和美国在“冷战”局势下的亚洲政策目标可定位为:尽可能削弱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严防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散。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英美两国的领导人都担心,在一个充满了革命激情的共产党政权领导下,中国可能会积极向其他亚洲国家输出革命,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暴力活动,在亚洲扩散共产主义影响,成为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英美两国政府还担心,一旦中国的这种渗透活动在某一个国家取得了成功,很有可能在亚洲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使得资本主义阵营失去在亚洲的一切。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英美两国在其亚洲政策的框架内,明确了对中国政策的总体目标:防止中国在亚洲扩散共产主义,削弱中国同苏联的联系,避免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

虽然英美两国在中国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但这两个国家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所计划采用的手段却大相径庭。所谓“计划采用的手段”是指,英国和美国政府完全基于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以及对政策有效性的认识,在不受对方干扰和压力影响的情况下,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所打算采用的手段。

1949年2月,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后不久,应51名共和党众议员的要求,同他们谈中国问题。有人问他对局势发展如何估计,他答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倒下,要等待尘埃落定,才能看清其造成的后果^[3]。“等待尘埃落定”就成为代表此后一段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名言,用来形容美国对华政策的犹豫观望。但这种观望并非“静观其变”,而是在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的同时,观望其

发展趋势。在政治上,美国不打算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的政府,仍然承认盘踞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政府,并设法阻挠其他西方国家承认中央人民政府;美国继续认为国民党代表应该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反对新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在经济上,美国政府计划并最终实施了对新中国的经济禁运,从最初对军用物资的禁运,发展到对军民两用物资的禁运,最后实施全面经济禁运。在文化上,美国加强了对华宣传攻势,对中国的调子非常不友好,集中于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工具的鼓噪^[4]。从总体上说,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封锁、孤立、遏制等强制性手段。

相对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具体政策而言,英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态度和计划推行的具体政策较为温和。在政治上,英国计划并最终成为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的政府的国家,撤销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承认;英国在联合国也为新中国的代表权积极努力过,并在这个问题上投过赞成票。在经济上,英国一直希望同新中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积极开展双边经贸关系,香港同大陆的经济往来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在文化上,英国的宣传媒体对新中国的宣传相对于美国而言较为客观、公正,并没有采取完全敌视的态度来肆意歪曲。从总体上说,英国政府希望对新中国采取接触、沟通等温和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既然美国和英国在中国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又在“冷战”的同一阵营里,为什么两国为了实现目标所计划采用的手段却有着如此明显的区别呢?这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1. 英美两国在中国的利益结构不同;2. 英美两国对承认一个政权的认识不同;3. 两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以及如何有效地离间中苏关系的理解不同。

英美两国在中国不同的利益结构:虽然英美两国在中国都有重大的利益,但其结构并不相同。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中,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利益并重;美国在中国最主要的则是政治和安全利

益,它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相对而言很小。

英国的确在中国有着相当大的经济利益,这主要表现在英国在中国的投资上。1946年英国在华投资总额占同期外国在华投资总数的63.2%,为美国的3倍多。英国在华资本渗入了金融、贸易、运输、矿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等广泛的领域^[5]。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在华资产仍维持在3亿英镑左右,英国人掌握着上海的电车、煤气、自来水公司、船厂和许多港口设施。此外,英国在华的大企业还有开滦煤矿、英美烟草公司等。英国同中国之间的贸易相对英国在中国的投资而言,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重要。从1949年到1954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仅占英国总出口的0.2%,从中国的进口仅占其总进口量的0.25%^[6]。但是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于英国这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而言,其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相对而言,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就小多了。虽然美国在中国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但大部分都被国民党政权消耗在中国内战中,或被国民党中的一小部分人中饱私囊了。

在政治和安全利益上,虽然中国对英美两国而言都很重要,但对美国的重要程度则远远超过英国,其中很大部分是历史原因。英国在战后同中国的关系远没有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密切。英国在1942年就渴望同中国签订《中英商业条约》,希望能通过这个条约来维护其战后在华经济利益,但就在英美几乎同时就这个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的情况下,美国在1946年11月同中国签订了《中美商业条约》,而英国却始终不能如愿^[7]。中国内战期间,美国为了帮助国民党政权取得胜利,曾大力给它种种的支持。到1946年6月,美国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就已经达到了18.3亿美元^[8]。虽然英国也在军事装备以及军事人员的培训上援助过国民党,但同美国的援助相比则微不足道。先是有一批国民党的海军军官被送到英国接受训练,然后英国政府在1945年底同国民党政府签订协议,租借给国民党政府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两艘

潜艇、一艘轻巡洋舰、八艘摩托快艇以及相应的设备,这些舰艇上的国民党船员都被安排到英国接收训练^[9]。正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政治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心血,所以中国对美国在政治上来讲非常重要,中国被共产党政权控制这样一个事实对美国的冲击是英国所难以想象的。此外,“冷战”中直接同苏联对抗的是美国,最关心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也是美国。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被共产党政权控制,在美国人看来不仅对其麾下的日本和南朝鲜等中国邻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是美国难以接受的。

英美两国在华利益这种结构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它们去选择何种手段来维护其在华利益。英国需要同时维护其在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温和接触的方式对于照顾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利益而言,似乎更加得心应手。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那种失落情绪,及其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推动美国倾向于用激进的方式维护其在华政治利益。

英美两国对承认一个政权的认识不同:能否同一个国家进行积极有效的接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对这个国家的政权是否给予正式的承认,而承认一个国家政权的条件在英美两国看来有很大不同。美国助理国务卿艾迪(Adee)曾在1913年用官方的名义写过,“对于两国间进行国际事务所必需的承认是有条件的:这个政权必须控制国家行政机器;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必须有能力和意愿来履行国际义务和惯例”^[10]。承认一个国家政权的这些先决条件在艾奇逊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艾奇逊在1949年5月发出指示,联系中国问题提出了美国承认一个新政府的三个条件:1. 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包括维持公共秩序;2. 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3. 其掌权得到本国人民普遍接受^[11]。但是英国政府的认识却不是这样的,英国认为,只要第1条和第3条得到了满足,就足以对一个国家政权进行承认了。

除此之外,英国和美国对承认一个国家政权的意义也存在着

很大的分歧。丘吉尔曾经说过,英国对一个国家的承认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意识,他们承认一个国家,并不代表着认同这个国家的做法。也就是说,英国承认一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在政治上认识到这个国家政权的存在,及其对那个国家的控制。它并不期待能够通过承认一个国家政权而改变其行为^[12]。在英国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的政策中有一个明显的三段论:英国要承认事实;共产党控制中国已经成为事实;因此英国应该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然而美国却并不把对一个国家政权的承认看得这么简单。美国认为对一个政权的承认不仅是从事实或者政治尺度上考虑,而且应该是对法律、道德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外交上的承认并不简单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道义上的允诺,包含着权利和义务。

两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以及如何有效离间中苏关系的理解不同:对于刚成立的中国新政府,美国和英国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应该说,美国更多的为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所蒙蔽,而英国的认识则较为客观和务实。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傀儡,中国同那些东欧国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美国认为从1948年11月刘少奇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文发表,中共就已经公开声明完全恪守苏联的教条,并自认为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共的表现说明他们是世界反帝阵线中一个“聪明的、遵守纪律的年轻盟友”,看不出有脱离苏联教条的痕迹^[13]。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公开宣布“一边倒”。司徒雷登报告称:“应该感谢毛泽东,他空前清楚地说明了最高领导的立场,不必再从字里行间来寻找他们实际执行的和公开声明的政策之间有何不同”^[14]。1949年7、8月间,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在“对中共短期与长期的估计”中指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和影响比其对南斯拉夫的影响要大,而且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后面临的国内问题和困难比南斯拉夫复杂得多,对苏联帮助的需求也要大很多。因此,他们认为中

国发展“铁托主义”的可能性不大。艾奇逊本人在1949年10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说：“这个中国政府是真正的俄国帝国主义工具，这是我们考虑对华关系的出发点”^[16]。于是美国政府决定通过封锁、孤立的手段，让中国认识到同苏联站在一边会带来的困难；他们还希望在封锁、孤立政策的作用下，会逼迫中国向苏联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最终导致中国因为苏联不能满足其需要而对苏联失望，转而投向西方国家的怀抱。

同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认识相反，英国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苏联共产党的傀儡。贝文说，英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俄国人”^[17]。但是英国也不认为中国会成为又一个南斯拉夫，尤其是英国外交部的远东司。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伯格（T. Burgess）在1949年6月底曾明确指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都不会步铁托的后尘，中国共产党是最先支持苏联对铁托的制裁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人都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8]。

虽然英国不认为毛泽东会成为第二个铁托，但英国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普通的苏联卫星国，苏联对毛泽东的控制不是确定的和绝对的，苏联同中国的盟友关系也不是永久的。英国政府相信，在短期内因为其自身的脆弱和周围环境的特殊，中国可能会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但是很难相信中国会最终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的面积、人口、地理位置、种族构成以及长久的历史记忆，都不允许毛泽东成为莫斯科的助手和配角。英国驻美国大使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指出，“从长期来看，很难保证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为具有侵略性的苏联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苏联人现在花了很多的力气来将中国作为一个平等、自由、独立的力量对待，但是如果苏联要从中国身上获得它想要的东西，它一定会在最后关头被迫去压制中国。如果它这样做，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会像以往一样，尽力抵抗外国势力对中国的控制企图。一旦这种情况发生，而中国对我们的大门又还没有彻底关上，中国就有可能